

跨界民族与地区安全： 中东库尔德问题的生成与嬗变

李睿恒

内容提要 肇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库尔德问题,长期以来并未表现出整体性的地区安全内涵,而是演化为“各国库尔德问题”。受大民族主义叙事和集体性惩罚措施的激化,库尔德社会生成“他者化”的集体创伤记忆,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四国政府成为库尔德人“自我”整合时共同的“他者”。在现代通信技术进步与 2011 年中东变局的诱发下,集体创伤记忆转化为共同的对外政治行为,库尔德人在时间、空间、行动和理念四个维度跨界联动,引爆“库尔德之春”。这表明民族跨界而居的客观现实不意味着跨界民族必然构成一个地区安全问题,只有在其各自所在国国内机制和国际变局两个层面的合力作用下,跨界民族才有可能内聚于各国跨界交汇地带,进而整体反向对该地区形成地缘安全冲击。

关键词 非传统安全 中东 库尔德问题 民族主义 跨界民族 地区安全 集体记忆

* 李睿恒: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邮编:100871)

** 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的审读和修改建议,文中疏漏和不足之处概由笔者负责。

跨界民族和民族跨界而居的现象古已有之,但受现代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和民族国家主权观念的深刻影响,无论是从存在性威胁的客观视角还是建构性威胁的主观视角来看,在不同程度上,跨界民族都构成或被认定为一个安全问题。然而,受现代国家既有主权边界的规制和各自所在国特殊国情的影响,跨界民族不必然成为一个安全威胁。即使在跨界民族政治精英追求民族主义建国诉求而形成安全问题的情况下,他们也多会强调自身所在国境况的迫切性与优先性,各国跨界民族内部及其之间的利益差异不会因泛化的民族情结而消弭,其族内还可能产生路径之争,拒绝相互联动与配合。因此,跨界民族形成的安全威胁内涵主要局限为其所在国的国内安全属性,各国的跨界民族问题表现为具有相对独立乃至相互排斥的周期及波段的特点,难以实现同时或同频的跨界“共振”,从而真正构成一个地区安全问题。换言之,判定跨界民族是否上升为一个地区安全问题的标准在于该民族是否内聚至其所在各国的跨界交汇地带,并以该地带作为其建立自身民族国家的属地,从而整体反向地冲击跨界民族所在地区的既有国家秩序。在此意义上,以跨界民族所在各国所处的地区来界定该问题为一个地区安全问题,实际上更多是一种地理上的客观描述或威胁认知下的主观修辞。

在此类现象中,作为中东地区与全球范围内最大的无国跨界民族,人口总量近 3500 万的库尔德人是最为典型案例。现代意义上的库尔德问题虽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迄今已有逾百年历史,但在大部分时期内,库尔德人并未展现出所谓的“中东库尔德问题”的(中东)地区整体内涵,而是依其所居的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四国为界,在不同周期和限度上发挥各自的作用,演化为“各国库尔德问题”,其安全威胁主要限于各国内部。但是,随着 2011 年中东变局爆发,各国库尔德问题升温,并在一定程度上同频发酵与联动:第一,在时间维度上,各国库尔德问题的爆发出现“同时共振”与“时差缩减”的态势;第二,在空间维度上,库尔德斯坦各次区域在国家边界的限制上取得突破,库尔德斯坦作为整体的内聚性得到强化;第三,在行动维度上,自治实践突破伊拉克库区单一案例,向叙利亚库区传导,并引发库尔德人内部激烈的模式竞争;第四,在理念维度上,各国库尔

德人主题与限度不一的政治诉求得到超越,代之以对自治的共同追求,伊拉克库尔德人则开始谋求独立建国的突破。库尔德问题对现代中东的政治和安全秩序发起最大的历史性挑战,这一嬗变被学界和媒体形象地称为“库尔德之春”(Kurdish Spring)。

库尔德斯坦地区是一个自然地理与历史文化概念,库尔德人为何在库尔德问题发端逾百年之时才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地区联动?即从库尔德人内部视角而言,这意味着为什么泛库尔德主义/库尔德性(Kurdayeti/Kurdishness)开始发挥内向聚合的作用,使作为整体的库尔德斯坦而非各国的库尔德地区,开始成为库尔德人的主体活动空间,以挑动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神经?反映出的深层次问题是,在何种机制与因素的影响下,跨界民族得以突破其各自所在国的边界和国情限制,生成一个地区层面的安全问题?这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

目前,学界对此有三大解析路径:(1)原生主义学派路径。强调库尔德民族的历史性、延续性、属地性和独特性,即库尔德民族作为中东最古老的一个民族,拥有自身独特的语言、文化和历史居所库尔德斯坦。^①该路径将库尔德民族主义视为一种连贯于现代前后的本质现象。这决定了库尔德民族与其他民族天然的异质性乃至互斥性,进而构成现代库尔德民族问题在地区爆发的历史基底。^②(2)建构主义学派路径。主张库尔德民族是被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建构而生的现代产物,库尔德问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现代性的产物。^③民族主义让库尔德人视建立一个库尔德国家为最终目标,因此,库尔德人必然会对整体的地区安全秩序带来冲击。(3)族裔民族

① Cecil Edmonds, "Kurdish Nationalism,"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Vol.6, No.1, 1971, p. 88.

② 参见[伊拉克]瓦迪·贾维达:《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起源与发展》(阿拉伯语),贝鲁特:法拉比出版局,埃尔比勒:艾拉斯出版局2013年版,第59页。Mahir Aziz, *The Kurds of Iraq: Nationalism and Identity in Iraqi Kurdistan*, London: I. B. Tauris, 2015, p. 55; Amir Hassanpour, *Nationalism and Language in Kurdistan 1918-1985*, San Francisco: Mellen Research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55-56.

③ Abbas Vali, "The Kurds and Their 'Others': Fragmented Identity and Fragmented Politics," in Faleh Jabar and Dawod Hosham, eds., *The Kurds: Nationalism and Politics*, London: Saqi, 2006, pp. 49-50; Abbas Vali, "Genealogies of the Kurds: Constructions of N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Kurdish Historical Writing," in Abbas Vali, ed., *Essays on the Origins of Kurdish Nationalism*, Costa Mesa: Mazda Publishers, 2003, p. 75.

主义学派路径。该路径调和了前两种路径,在承认库尔德人作为一个独特“种族”长期存在于历史之中的同时,否定了原生主义学派将其等同于库尔德民族主义古已有之的论断,^①但其“种族”意识,或有助于形成民族主义式的主权诉求。因此,库尔德独立建国的目标决非必然,因为在被划分到四国后,他们还深受所在国主体民族领导的现代国家建构进程的结构性影响,衍生出不同的民族运动发展轨迹。可见,该路径实际上偏倚于建构主义学派,只不过在解析以库尔德人为代表的无国民族时,已将参与建构“民族”的主体,从前两派单一强调的“民族”本身,向他们所居的现代国家内^②及其横向的地区层面^③及纵向的国际层面^④等更广的体系拓展。

三派路径侧重点不同。第一和第二派路径聚焦族群层次,过于本质主义,解释力有限;第三派的调和路径极大地拓展了库尔德问题的历史深度和现实细度,但仍有两大缺憾:(1) 研究主要以库尔德人所在四国为界,对作为整体的“库尔德之春”解释力还明显不足;(2) 尽管既有研究正确且根本性地将“库尔德之春”归因于中东变局,然而,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今,库尔德人经历数次重大地缘政治变局,为什么恰是 2011 年中东变局诱发出“库尔德之春”这一问题本身需要做出合理的解释。换言之,既有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把国内体系和国际政治体系两条主线对立了起来。

① Martin van Bruinessen, “Kurdish Paths to Nation,” in Faleh Jabar and Dawod Hosham, eds., *The Kurds: Nationalism and Politics*, pp. 33-35.

② 参见 Lisa Blaydes, *State of Repression: Iraq under Saddam Hussei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pp. 133-162; Denise Natali, *The Kurds and the State: Evolv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 Turkey, and Iran*,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60-189; 唐志超:《中东库尔德民族问题透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312—317 页;汪波:《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北京:时事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1—25 页;敏敬:《中东库尔德问题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62—269 页;李秉忠:《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和库尔德问题的演进》,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31—449 页。

③ 参见 Ofra Bengio, *The Kurds of Iraq: Building a State within a State*,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12, pp. 65-78, 104-106, 125-148, 169-191, 245-268; David Phillips, *The Kurdish Spring: A New Map of the Middle East*, New Yor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15, pp. 189-235; Gülistan Gürbey and Arzu Yilmaz, “Geopolitical Shifts and Ethnic Conflicts: The Transnational Kurdish Conflict in the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flict and Violence*, Vol. 16, 2022, pp. 1-13; [黎巴嫩]福阿德·马塔尔:《被出卖的库尔德人:不可能家园中的国家幻景叙事》(阿拉伯语),贝鲁特:阿拉伯科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④ 参见 Douglas Littl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Kurds: A Cold War Story,”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Vol.12, No.4, 2010, pp. 63-98; Bryan Gibson, *Sold Out? US Foreign Policy, Iraq, the Kurds, and the Cold Wa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鉴于此,本文主张以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将第三派路径进行综合建构,尝试将其延伸而出的国内政治体系与国际政治体系整合,解析中东变局以来库尔德问题所发生的嬗变。在该理论假定下,国际体系是导致任何一国对外行为发生变化最深层次的诱因,但只有同时加入国内政治这种单元层次的干预变量,才能完善解释的逻辑链条,因为它决定了自变量国际体系在改变外交行为时发挥作用的大小,即国内政治把国际体系和外交政策串联到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之上:国际诱因—国内政治—外交选择。^①

首先,就自变量国际诱因而言,本文将其限定为地区层次的中东变局,而非结构性的国际体系变动。变局之下,库尔德人所在国要么属于地区权力阵营的核心国家(土耳其和伊朗),要么属于权力失序的焦点国家(叙利亚和伊拉克)^②,这意味着他们面临的国家干预能力处于一种微妙的消长状态中。同时,与变局相伴生的,还有以卫星电视频道为代表的现代传媒技术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通信技术等现代技术的强烈冲击^③,这为库尔德问题在主权国家实体边界外创造了全新的虚拟空间。其次,在作为干预变量的国内政治层面,四国库尔德问题自身也需有所突破。四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长期以来的失衡,纵向整合了库尔德民族的集体记忆,并借助新技术手段实现横向传导。从此意义上来看,现代技术早于中东变局开始成为诱因,只是相较于地区体系变动而言,其影响力有着局限性、隐蔽性与滞后性的特点。最后,作为因变量的外交行为,库尔德人虽然没有国家实体来形成统一的外交政策,但从内部视角看,变局后其相应地突破既有国家边界,在多个维度上实现一定的联动以成“库尔德之春”,本质上是外交政策所属的对外行为的范畴。

综上,本文将解析框架分为两部分(如图1所示):(1)四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中民族政策失衡导致的族群集体记忆生成;(2)地区体系结构变动

① 陈志瑞、刘丰:《国际体系、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构建和经验拓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3期,第111—128页。

② 吴冰冰:《中东地区的大国博弈、地缘战略竞争与战略格局》,《外交评论》2018年第5期,第62—64页。

③ [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450—45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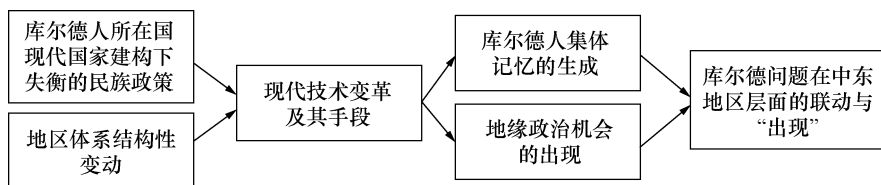


图1 库尔德问题走向中东的根源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带来地缘政治机会的出现。此外，现代技术变革作为一种较新的因素，兼具诱因和干预变量的双重性，因此，本文将兼顾分析该因素在两个层面的作用。为此，本文结合中文、英语与阿拉伯语文献中的学理性与经验性研究成果，以族群层次与国家层次交织下的集体记忆和国际政治层次的中东变局两个因素为基础，论证在什么背景、条件和机制下跨界民族库尔德人在中东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界”，解答为何“库尔德之春”是一个晚近才发生的现象，系统分析和梳理中东变局以来库尔德问题在地区意义上的生成和嬗变。

一、“他者化”的集体记忆：中东库尔德问题的生成机制

作为国内政治因素的四国库尔德问题之所以发挥推促性干预作用，被中东变局引发为“库尔德之春”，其原因在于库尔德人所在四国长期以来程度不一的民族政策失衡，导致各国库尔德人逐渐形成贯通政治精英和社会大众的民族集体记忆，并借助新技术手段相互传导和强化库尔德人的“自我”认同，以及对各自所在国主体民族和政府的“他者”意识。

（一）集体记忆与民族建构

民族作为现代政治中最核心的集体单元，集体记忆自然构成了民族成员集体认同的重要来源，正如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历史社会学家安东尼·史密斯(Antony Smith)指出，“没有记忆就没有认同”，而认同则是“民

族概念的必要元素”。^①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精神病学家维米克·沃尔坎(Vamik Volkan)将集体记忆归纳为“选择性荣耀”(chosen glory)和“选择性创伤”(chosen trauma)两类。^② 鉴于集体记忆的认同叙事有着界定“集体的成员是谁”和“集体的敌人是谁”的双重功能,本文认为“选择性荣耀”的作用在于正向地建构集体向内的“自我”认同,而“选择性创伤”则通过强调“他者”来反向确立“自我”。在此基础上,学界研究把集体记忆的作用从塑造“观念”向创建“制度”和激化“行动”方面拓展,以之解释国际政治中的民族冲突。^③

可见,集体记忆对民族建构发挥着巨大影响力。由于具有行动意义的“库尔德之春”是在库尔德问题生成近百年后的中东变局时才出现,需要先从观念和认知层面对库尔德人集体记忆的生成和与其民族认同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这是库尔德人得以作为一个民族共同行动的内在基础。

(二)“他者化”与库尔德人集体记忆的生成

库尔德人关于民族历史的集体记忆更多来自对“他者”的区分,而非源于均质统一的“自我”,即库尔德人集体记忆中的“选择性创伤”多于“选择性荣誉”。一方面,这既是综合性因素沉淀而来的历史情结;另一方面,这主要是相关四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中民族政策失衡造成的政治结果。

1. 族源神话与“他者化”的历史情结。库尔德人虽然是中东的第四大民族,但他们却没有像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土耳其人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有着长期且丰富的帝国统治实践,因此,他们也没有属于自身连贯且系统的历史记述,而是作为其他历史帝国的边陲被散记于异族史家的笔下,难以得到足够重视和清晰记载。尽管如此,库尔德人关于自身历史的集体记忆依旧通过口口相传的族源神话得以成形,并由此凝结出一种“库尔德人只有大山”、被他人抛弃的历史悲情。在库尔德人的族源神话中,流

① Antony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1988, p. 2.

② Vamik Volkan, *Bloodlines: From Ethnic Pride to Ethnic Terroris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7, pp. 81-83.

③ 汪铮:《历史记忆、认同构建与政策行为:两种分析框架》,杜欢译,载陈明明主编:《治理与制度创新·复旦政治学评论》(第十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81—190页。

传最广的有二则。

其一,库尔德人是遭古代以色列王国抛弃的产物。相传所罗门派出百余名精灵赴欧洲为其寻找女奴,但归来时所罗门已经去世,王国陷入动乱,精灵们乘乱将带回的女奴据为己有。局势平息后,新国王视这些女奴及她们产下的孩子为不洁,把他们驱逐到大山之中,在那里他们世代繁衍生息,成为库尔德人的祖先;^①其二,库尔德人是遭古波斯王国抛弃的产物。据称,俾什达迪王朝国王佐哈克因暴虐统治遭到神的惩罚,两肩生蛇,咀食其肉。魔鬼蛊惑佐哈克每天向蛇喂食两个人脑,以减缓其痛楚。屠夫心生怜意,每天暗中放走一人,让他们逃入深山躲避。这群幸存者来自不同的群体和地域,长此以往,他们忘记了自己的语言,在新的融合中习得一门独特语言,形成自身的风俗和文化,成为库尔德人的祖先。^②

在不限于此二则的族源神话中,有三个共通的意象:(1)库尔德人遭遇不公;(2)库尔德人被驱赶;(3)大山是库尔德人的避难所。有研究将“库尔德人”(kurdi)一词与阿拉伯语动词“驱赶”(karada)相联系,认为“库尔德人”即是“被驱赶的人”。可见,库尔德人的历史情结中有着强烈的苦难感、被迫性和他者化的色彩,即库尔德人存在是一个被动过程,库尔德人的命运由他人所决定。客观来看,这与库尔德人13世纪遭到蒙古帝国征服和劫掠、16世纪被奥斯曼和萨法维两帝国瓜分的苦痛历史经历有密切关联。但他们同样在两帝国的统治下“因俗而治”,双方形成了一种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库尔德人虽然在其历史记忆中有着对“他者”强烈排斥,但“他者”的内涵则是模糊和流动的,而与之对照的库尔德“自我”也多以“大山”等不具辨识度的环境特征为表达,二者都不足以构成政治上团结库尔德人共同行动的基础。但是,这种“他者化”的历史情结却在后期库尔德人的现代历史遭遇中为他们建构集体内的共同想象提供了必要的历史素材。

2. 库尔德人集体记忆的“他者化”与政治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综

① [黎巴嫩]穆罕默德·塔古什:《库尔德人的历史(637—2015)》(阿拉伯语),贝鲁特:珍宝印刷出版发行公司2015年版,第16页。

② 同上书,第15页。

合因素作用下,库尔德人未能获得正式的现代国家系统来逆向塑造其民族,并且他们还面临所居四国官方族源叙事和国家建构实践形成的系统性限制。然而,正是这种限制的失衡,反向推促库尔德人集体记忆进一步走向“他者化”与政治化。

首先,在官方族源叙事上,库尔德人民族身份遭到四国否定或异化,官方民族主义首先成为库尔德民族主义精英的“他者”。

在土耳其,库尔德人的存在被否定,以土耳其民族主义思想家齐亚·格卡尔普(Ziya Gökalp)学说为代表,库尔德人被定性为“山地土耳其人”。在2005年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AKP)就库尔德问题提出“新思维”前,土耳其基本延续着民族独立运动后对该问题确立的保守底色。^①在伊拉克,为了与土耳其争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摩苏尔省的归属权,哈希姆王朝承认了库尔德人的文化身份乃至部分政治权利,但随着后期泛阿拉伯民族主义风靡政军两界,以及1958年后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左翼力量推翻君主制掌权,库尔德人也逐渐被认定为阿拉伯人,是近代殖民势力的阴谋让其忘却了自身的阿拉伯属性。^②在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情况与伊拉克类似,独立后的叙利亚同样持激进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否定库尔德人存在,把他们界定为“外国人”。^③在伊朗,库尔德人经历了1946年马哈巴德共和国的短暂高潮后,其身份地位也逐渐随巴列维国王确立君主专制而遭到淡化和否认,被认为是雅利安人的一部分。^④

不难发现,四国中央政府在界定库尔德人的族裔性时都彰显出强烈的大民族主义特点。但是,在亟欲实现国家现代化和库尔德社会结构依旧为部落与苏非教团所主导的背景下,四国的库尔德叙事初现时的库尔德政策却并未表现出相应的大民族主义属性,而是以“传统对现代、野蛮对文明、乡村对城市”这样的视角来展开,库尔德民众不仅没有成为官方大民族主

① 咎涛:《奥斯曼帝国晚期与现代土耳其官方关于“库尔德问题”话语的嬗变》,《阿拉伯世界研究》2020年第6期,第3—24页。

② [叙利亚]米歇尔·阿弗莱克:《库尔德问题和阿拉伯革命》(阿拉伯语),载复兴党主编:《为了复兴》(第五卷),1987年版,第36—38页。

③ Jordi Tejel, *Syria's Kurds: History, Politics and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2009, p. 51.

④ Denise Natali, *The Kurds and the State: Evolving National Identity in Iraq, Turkey, and Iran*, p. 134.

义的受害者,反而因各国政府为消解库尔德部落领袖叛乱的社会根基而受益:他们要么享受到石油财富打造的高福利政策,或得益于政府“分而治之”策略暂时免受土地改革等政策的影响。以伊拉克为例,20世纪70年代,复兴党政府对库尔德人的高福利政策有效地提升了本国库尔德民众对伊拉克的国家认同,塑造了他们与中央政府积极合作、打击库尔德运动和参加两伊战争的政治行为。^①

因此,各国官方排他性的库尔德族源叙事一开始仅在库尔德民族主义精英层面,特别是政治和知识精英群体内,引发着激烈的“他者化”对立,但并未过渡到部落与宗教特征固化的库尔德底层社会。由此来看,“库尔德问题”在社会民众层面一开始并非如精英理解的是一个认同和秩序的“高政治”问题,而是一个只涉社会经济利益的“低政治”问题。在单一国家的边界内,库尔德民族主义还无法达成贯穿精英和底层的共识,更遑论可以实现地区意义上真实有效的联动。

其次,在国家建构“民族”的实践层面,四国程度不一的民族政策失衡,导致四国政权变成库尔德人共同的“他者”,库尔德政治精英与底层民众被反向“整合”,开始共同想象一个抽象的“库尔德民族”,四国库尔德民族主义外延得到极大拓展。

随着四国在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中权力根基稳固,或当国家处于非常规状态下(如战争、政变等)及对库尔德问题威胁认定上升时,其大民族主义的库尔德叙事开始向政策实践转变。但是,鉴于库尔德斯坦山区形成的地理和交通阻碍,以及库尔德语造成的沟通限制,四国政府在认定部分民间村落为库尔德运动游击队提供了后勤补给的同时,却又无力对这些偏远地区进行有效甄别。因此,四国政府在对库尔德人开展族际政治整合的实践过程中,都表现出程度不一的集体性无差别惩罚的特点,以应对其在本国库区国家能力不足的困境。在土耳其,库尔德人的语言和文化权利被剥夺,政府在库尔德聚居区长期实行戒严和军事管制措施;^②在伊拉克,库尔

^① Lisa Blaydes, *State of Repression: Iraq under Saddam Hussein*, pp. 136-143.

^② Burak Bilgehan Özpek, “The State’s Changing Role Regarding the Kurdish Question of Turkey: From Consistent Tutelage to Volatile Securitization,” *Alternatives: Global, Local, Political*, Vol.44, No.1, pp. 35-49.

德人被施以激烈的阿拉伯化政策,并在两伊战争后期的激化下走向1987至1988年的“安法尔行动”(Anfal Campaign),库尔德平民及其村庄遭到大规模的化武袭击;^①在叙利亚,库尔德人同样被强制地阿拉伯化,甚至被剥夺公民权;^②在伊朗,巴列维王国时期和伊斯兰革命后的共和国政府都对库尔德人开展了程度不一的军事化与强制同化政策。^③

四国集体性惩罚的库尔德政策思路,从三条路径反向推促原本高度精英化的库尔德民族主义得以向下延伸,获得社会底层民众的认可(如图2所示):(1)当惩罚措施是严厉且集体性时,个体会更相信他和族群内的其他成员有着相互关联的“命运”,因为对其采取惩罚的依据并非以不同个体政治立场而细分,而仅仅是因为他们都是库尔德人,这从侧面激化了库尔德人从底层到精英对民族共同的政治想象;^④(2)当信息贫乏的国家从库尔德族群背景出发对其进行无差别惩罚时,库尔德人会强化内部的团结和监管,因为单一成员的行动可能对全体成员带来负面影响;^⑤(3)库尔德民众由此了解到,国家的甄别和监控能力是有限乃至低下的,这有助于他们相信,只有同族群内的成员愈发团结,才能够相对安全地组织和创建具有高度社会凝聚力的密集网络,以最大限度地降低政府集体性惩罚造成的伤害,库尔德民众也由此更愿意配合民族主义运动,采取全面政治或军事抵抗政府的策略。^⑥

这种“国家暴力压制族群叛乱导致族群身份认同上升并走向更为激进叛乱”的反作用理论假设,在土耳其和伊拉克表现得最为典型。一份针对74名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简称“库工党”,PKK)武装人员的调查显示,大

① Sherko Kirmanj, *Identity and Nation in Iraq*,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13, pp. 155-160.

② Kerim Yildiz, *The Kurds in Syria: The Forgotten People*, London: Pluto Press, 2005, pp. 91-121.

③ Alireza Asgharzadeh, *Iran and the Challenge of Diversity: Islamic Fundamentalism, Arya-nist Racism, and Democratic Struggl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pp. 85-155.

④ Lisa Blaydes, *State of Repression: Iraq under Saddam Hussein*, p. 47.

⑤ James Fearon and David Laitin, “Explaining Interethnic Cooper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0, No.4, 1996, pp. 715-735.

⑥ Roger Petersen, *Resistance and Rebellion: Lessons from Eastern Europ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5-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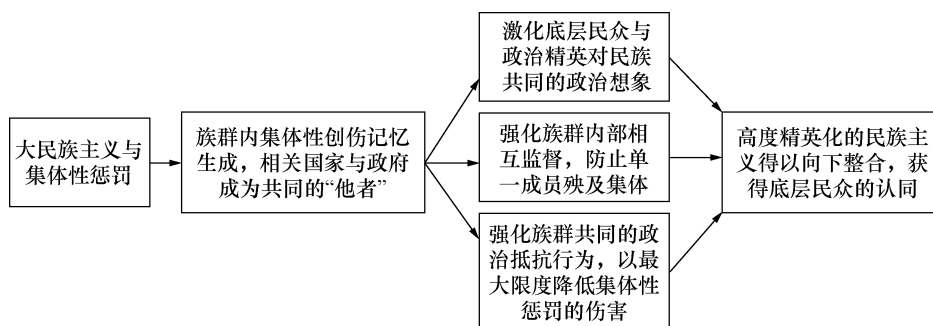


图2 集体惩罚、集体记忆与民族认同的纵向整合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部分人加入库工党叛乱的原因不是出于经济利益，而是土耳其国家暴力对他们的近亲或周遭社群严厉且无差别的惩戒行为，引发了他们的复仇心理，他们从而选择放弃优渥的生活，去偏远山区参加叛乱。^① 伊拉克库尔德人则在“安法尔行动”后形成两方面更具规模的反弹：其一，长期竞夺民族运动领导权的库尔德斯坦民主党（简称“库民党”，KDP）和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简称“库爱盟”，PUK）放弃对抗，联合成立伊拉克库尔德斯坦阵线（IKF），一致对抗复兴党政权；其二，在1991年海湾战争后，库尔德民众自发起义，并由亲政府的库尔德部落民兵首先领导；而在随后政府断电、停水和停薪的胁迫下，30万在政府任职的库尔德人都拒绝转移至政府控制区，共克时艰。^② 库尔德人起义的规模和抵抗的频度不但超出伊拉克政府的想象，也是库尔德斯坦阵线所未曾预料到的。^③

综上所述，在库尔德民族的集体记忆中，长期存有一种迫于外界形势压力而生成的“他者化”的历史情结，并被凝练成以“库尔德人被抛弃和逃入深山”为母本的族裔神话，在库尔德社会中口口相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由库尔德人所在四国大民族主义的库尔德族源叙事，以及无差别集体性惩罚政策的激化，这种“他者化”的历史情结被具象为库尔德人对各自

① Güneş Murat Tezcür, “Ordinary People, Extraordinary Risks: Participation in an Ethnic Rebell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10, No.2, 2016, p. 256.

② Ofra Bengio, *The Kurds of Iraq: Building a State within a State*, p. 201.

③ David McDowall,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 London: I. B. Tauris, 1996, p. 371.

所在国国家和主体民族的政治排斥和抵抗,库尔德民众的民族意识被反向刺激,与高度精英化的民族主义运动相整合。库尔德民众“低政治”意义上的民族认同,因作为“他者”的四国政府对库尔德人造成的集体性创伤记忆而得到强化并政治化。这构成了四国库尔德问题横向在地区联动的国内政治基础,是干预国际体系变动诱因作用大小的核心变量。

二、国际变局:中东库尔德问题生成的外部诱因

四国架构下的库尔德民族主义虽然因各自所在国政府库尔德政策的失衡被逆向整合,为他们构建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必要的集体记忆素材和共同的“他者”,但在缺乏国际体系机制关键性的诱发下,集体记忆很难突破国家结构既有的限制,转化为连贯的政治行动和坚定的政治认同。在此,伊拉克库尔德人首先取得突破,借1991年海湾战争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先后实现事实性自治与合法性自治,并通过库尔德斯坦地区政府(简称“库区政府”,KRG)系统性的制度手段确立这种集体性创伤记忆,以强化本国库尔德人的民族主义认同和行为。^①然而,库尔德问题要取得进一步的突破、走向“库尔德之春”,还有赖于国际体系在两方面更深刻的变化:其一,全球化进程中现代传媒与通信技术的进步;其二,2011年中东变局创造的地缘政治机遇。

(一) 现代传媒与通信技术拓宽库尔德人共同想象“民族”的虚拟空间

报纸、小说等传统印刷业的发展虽然“创造了一个超乎寻常的群众仪式”,^②让越来越多的人将“自身与他人关联起来”^③,强化着他们对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但却依旧面临识字率低和语言差异的掣肘。而现代传媒与通信技术的发展则为民族主义精英“找到了不经由出版印刷就能宣传想象的共

① 刘毅:《民族冲突中的历史记忆政治化:伊拉克库尔德独立运动中的“安法尔行动”》,《国际政治研究》2020年第5期,第133—140页。

②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1页。

③ 同上书,第33页。

同体的方法,而且他们不只向不识字的群众宣传,甚至也向阅读不同语言的识字群众宣传”。^①

从1898年首份库尔德语报纸《库尔德斯坦》刊发至1985年,库尔德语报纸的数量增长不超过150份,20世纪90年代后因库区政府成立等原因库尔德语报纸数量有较大增幅,然而传播力非常有限。即使到2010年,在人口数量近500万的伊拉克库区内,最畅销的库尔德语报纸的日均分发量也不超过1万份,不足以充分发挥民族认同催化剂的作用。^②但是,卫星电视与特别是后期蓬勃发展的手机与互联网等技术,极大地解决了传统印刷业传播力不足的困境,为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员手段与活动平台。

1. 在以卫星电视为代表的现代传媒技术方面,“MED-TV”开启了库尔德人创办卫星电视的先河,乃至被许多观察家认定为第一个由无国民族掌控的卫星电视。^③该电视台由立场上亲库工党的库尔德海外移民于1995年创办,播放语言不仅包括三种库尔德语方言,还有英语、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辐射范围覆盖西亚、南亚、中亚、北非和欧洲,旨在“发展库尔德文化和语言,为库尔德人提供交流途径”。^④虽然“MED-TV”1999年就因土耳其政府的施压被取缔,但它的传播效果对其他库尔德人形成示范,推促21世纪后的20年间出现百余个库尔德电视台,其中包括“MED-TV”更名后的“Roj-TV”、库民党1999年成立的第一家库尔德斯坦地区的本土电视台库尔德斯坦电视台(Kurdistan TV),以及库爱盟2000年资助建立的“KurdSat TV”。这些电视台的存在及其对中东各国及海外库尔德人情况的报道,强烈地塑造着各地库尔德人间的“感同身受”。

以库尔德斯坦电视台为例,除常规的实时新闻外,近50%的节目都专注于介绍整个库尔德斯坦或各国库区的历史、地理和风土人情等,并且在

①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1页。

② Jaffer Sheyholislami, *Kurdish Identity, Discourse, and New Medi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 80.

③ Ibid., p. 85.

④ Karim Karim, “From Ethnic Media to Global Media: Transnational Communication Networks among Diasporic Communities,” *Canadian Heritage*, June, 1998, p. 10.

涉及库尔德斯坦次区域的节目时,主持人、制片人、导演、嘉宾、受访者和播报方言的选取,基本上都会向来自该地区的库尔德人倾斜。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社会语言学家贾菲尔·谢霍伊斯莱米(Jaffer Sheyholislami)把库尔德斯坦电视台的传播策略归纳为五个层次的叙事建构:(1)库尔德人共同的历史叙事;(2)库尔德人共同的当下和未来叙事;(3)库尔德人共同的语言叙事;(4)库尔德人共同的民族象征叙事;(5)库尔德共同的土地与故乡叙事。^①就卫星电视在塑造和强化民族认同方面发挥的作用,伊拉克库区前主席、库民党总书记马苏德·巴尔扎尼(Masoud Barzani)在库尔德斯坦电视台成立22周年庆典上直言不讳地表示,该电视台及其所属的库尔德斯坦卫星电视基金会(KSF)的使命,就是在于传递库尔德“解放运动的合法之声”及“传播(库尔德人的)民族意识”。^②

2. 在以手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通信技术方面,智能手机、网站与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照片墙(Instagram)和“油管”(YouTube)等社交媒体,进一步打破空间与时间上的阻隔,强化中东和全球范围内库尔德人间的联系,以及他们对库尔德斯坦地区的整体想象,特别是对长期旅居海外的库尔德移民及其后代,进而开启了库尔德人的“线上民族建构”。^③这主要表现在“包容性”和“排他性”两方面。

其一,库尔德人由此获得一种对库尔德斯坦的整体感,而不再囿于自己所处的地区和时区来“狭隘”地理解库尔德问题,民族主义思想在各国的库尔德人之间变得更为包容。以1996年成立的华盛顿库尔德机构(Washington Kurdish Institute)为例,从2015年9月起,其开始在官网上推出《库尔德斯坦周报》(*Kurdistan's Weekly Brief*)系列,时刻跟进四国的库尔德局势,并配以综合性的介绍、分析、评论和采访等信息。^④此外,各大库尔德卫星电视在各个社交媒体上都有自己的账号,将播出过的节目转化为视

① Jaffer Sheyholislami, *Kurdish Identity, Discourse, and New Media*, pp. 95-138.

② “President Barzani’s Message on the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First Satellite TV in Kurdistan,” ARK, January 18, 2021, <https://www.arknews.net/en/node/26383>, 2023-8-18.

③ Hossein Aghapouri, “Nationalism and Diaspora in Cyberspace: The Case of the Kurdish Diaspora on Social Media,” PhD Dissert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February, 2018, p. 148.

④ 参见组织官网 <https://dckurd.org>。

频,弥补了电视传播方式覆盖范围和时效方面的不足,可让不同地域和时区的库尔德人随时观看。

其二,库尔德人在各自所在国经历的大民族主义下的集体性惩罚,被新闻网站和社交媒体报道后扩散与放大,四国库尔德人“他者化”的集体性创伤记忆得以共享和共鸣,库尔德人可随时随地在聊天组、发帖和评论中分享各自遇到的失业、失学、压迫等问题,四国政府由此被进一步泛化为一个库尔德人共同的“他者”,库尔德民族主义的排他性特征也随之上升,库尔德网民更愿意也可以更容易地将自己界定为一个“库尔德人”。^①

(二) 2011 年中东变局及其为库尔德人创造的地缘政治机遇

库尔德民族主义在现代技术进步提供的虚拟空间中所取得的进展优势,依旧离不开现实空间来实现转化。2011 年爆发的中东变局为库尔德人创造了三方面的地缘政治机遇。

1. 中东变局在相关国家内引发无政府状态,传统国家边界遭到弱化和消解,库尔德人收获在地与跨境活动空间。这一层次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表现显著。2011 年 3 月,叙利亚危机爆发,并于 7 月由反对派和平示威转入武装冲突。在外部支持和反对派内部整合下,政府军在战场上严重受挫,领土大面积失守,势力范围一度缩减至原有版图的 20%。此外,反对派陆续在北部与土耳其及东部和伊拉克的边境取得一系列胜利,控制相关过境通道,打通与外部联系。在伊拉克,政府军因美国撤军和中东变局的外溢效应同样失去费卢杰、萨马拉和摩苏尔等大型城市及周边大面积领土。这意味着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库尔德人暂时摆脱了其开展相关活动最大的体系性障碍,分别在此前的政治禁忌和争端性问题上获得活动空间。同时,传统国家边界的弱化,也为各国之间库尔德人的跨境流动进一步提供便利。特别是对于库工党和伊朗库尔德民主党(简称“伊朗库民党”,KDPI)而言,前者在伊拉克之外的叙利亚北部地区,后者在伊拉克境内,都获得了更大的迂回空间。

^① Hossein Aghapouri, “Nationalism and Diaspora in Cyberspace: The Case of the Kurdish Diaspora on Social Media,” pp. 168-169, 194-196.

2. 中东变局引发叙利亚和伊拉克出现安全黑洞,库尔德人得到外部支持,成为国际社会打击恐怖主义威胁的重要抓手。中东变局造成的无政府状态导致安全真空,让大量伊斯兰极端主义武装组织赴叙利亚和伊拉克活动。2014年2月,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开始建立跨伊拉克与叙利亚的政权实体,使两国和地区的安全形势严重恶化。但是,无论是2003年后美国扶植打造的伊拉克新军队,还是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都无法有效应对不断上升的恐怖主义威胁。由此,库尔德人武装开始成为美国、俄罗斯和欧洲打击“伊斯兰国”组织重要的地面依托。更重要的是,除传统发挥较大作用的伊拉克库尔德人外,曾长期处于发展低潮的叙利亚库尔德人,实现了史无前例的重大突破。在此意义上,至少在2014至2017年打击“伊斯兰国”期间,库尔德人已不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不稳定性根源,而越来越多地被国际社会认可为一个潜在的稳定性因素。^①因此,库尔德人的活动也能得到更多外界特别是大国的默许乃至支持。

3. 中东变局为库尔德人民族“自我”的确立持续塑造着共同的“他者”。一方面,这与中东变局引发的安全黑洞相关,库尔德人面临新的共同的“他者”。在叙利亚,随着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冲突扩大至艾因角等库尔德人居住区,以及极端组织占领库尔德城市科巴尼及其周边大量村庄,叙利亚库尔德人逐步建立和完善自卫武装;^②在伊拉克,极端组织也曾一度逼近库区首府埃尔比勒形成严重威胁,库区合法自治武装“敢死战士”(Peshmerga)也起而应战。换言之,“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成为在两国库尔德人新的共同敌人,库尔德人由此得以主动或被动地组织起来,协作应对共同的安全威胁。

另一方面,中东变局加剧地区地缘战略竞争,两大博弈阵营的领头国家土耳其与伊朗在其本国境内和跨境干预库尔德问题的意愿和能力都随之上升,两国作为库尔德人“他者”的传统形象被持续强化并向他国传导。其一,从意愿方面看,在变局后中东的新态势下,两国都将自己视为地区秩

^① Gülistan Gürbey, “The Role of the Kurds in the Middle East: A Regional Factor of Stability or Instability?” *Orient*, Vol.59, No.3, pp. 45-55.

^② 唐志超:《反恐抑或自治:叙利亚库尔德人反恐的双重性研究》,《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4期,第42页。

序发展的领导者与问题的解决方。^① 因此,面对演变日益激烈的库尔德问题,两国的认知也逐渐转回安全优先的传统轨道。其二,从能力方面看,当两国将对库尔德问题的安全认知转化为政策实践时,也因中东地缘局势变动而面临更少来自区域内或外的制约。以2016年8月“幼发拉底河盾牌”行动(Operation Euphrates Shield)为起点,土耳其多次跨境对叙利亚和伊拉克库区发起军事行动;^② 伊朗同样于2017年打破1997年与伊朗库民党达成停火协议,跨境打击该党在伊拉克库区设立的总部,开启了无人机和导弹频繁打击伊拉克库区的军事行动进程。^③ 两国不断安全化的库尔德政策及其在库尔德地区造成的平民伤亡和财产损失,进一步强化了两国政府在库尔德人心中“他者”的负面形象,并深化了库尔德人与他族“共同生存选择是并不存在”的历史知觉。^④

总的来看,国际体系层面的技术变化新内涵和2011年中东变局引发的地缘政治变动,给库尔德人在各自所在国积累而成的“他者化”集体性创伤记忆,分别开辟了虚拟和实体的行动转化空间,原本受制于国家边界的各国库尔德问题开始得以走向中东并生成“库尔德之春”。

三、“库尔德之春”:库尔德问题在中东的生成

在现代传媒与通信技术和2011年中东变局的诱发下,四国库尔德人“他者化”的集体性创伤记忆最终得到突破,在时间、空间、行动和理念四个维度下推促各国库尔德问题跨越国界,走向中东,即四国的库尔德人内聚性地走向库尔德斯坦。

① 吴冰冰:《中东地区的大国博弈、地缘战略竞争与战略格局》,第54—56页。

② Şaban Kardaş, “Turkey’s Military Operations in Iraq: Context and Implications,” *Middle East Policy*, Vol.28, 2021, pp. 133-143.

③ Nawras Jaff, “Iranian Protests and Attacks on KRI: An Attempt to Deflect from Domestic Turmoil,” *The Washington Institute for Near East Policy*, November 21, 2022, <https://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iranian-protests-and-attacks-kri-attempt-deflect-domestic-turmoil>, 2023-8-18.

④ [伊拉克]奇法赫·凯里姆:《伊拉克历届政府对库尔德人政策:从伊拉克建国至公投》(阿拉伯语),多哈:半岛研究中心,2018年9月,第6页。

(一) 各国库尔德问题呈现“同时共振”与“时差缩减”态势

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现代库尔德问题开始在四国逐步发轫以来,各国库尔德问题的演变呈现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时差异规律,而非同时或时间相近地爆发。虽然在20世纪20—40年代中期时,四国库区出现过时限相邻的库尔德问题爆发,但究其本质,这些问题依旧属于传统意义上的部落叛乱,其动员话语并非民族主义,而是“吉哈德”(Jihad)式的伊斯兰话语^①,且叛乱的地域范围有限,参与者也只为特定的家族和部落,而没能扩展至城市的知识精英群体,后者更多地被共产主义思想及其组织所吸引。因此,该时期库尔德问题“表面上看是民族主义的,但本质上却是部落的和宗教性的”。^②直至1946年,当库民党此类整合了主导性的农村部落力量和占人口少数的城市左翼力量的政治组织出现时,库尔德问题才具有相对代表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和精英化特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11年中东变局的半个多世纪中,各国库尔德问题的爆发情况为:(1)1946年,伊朗库尔德人建立马哈巴德共和国;(2)1961—1970年,第一次伊拉克库尔德战争;(3)1974—1975年,第二次伊拉克库尔德战争;(4)1984—1999年,土耳其库工党叛乱与恐怖袭击;(5)1991年,伊拉克库尔德人大起义。进入21世纪后的头10年,各国库尔德问题则进入低潮期,其原因有二:一是1999年库工党领袖阿卜杜拉·奥贾兰(Abdullah Öcalan)被逮捕入狱;二是伊拉克库尔德人2003年后转变为合法自治力量。可见,这一时期内各国库尔德问题爆发有显著的历时差异,表现为上述五波相互独立的高潮(如图3所示),且伊拉克库尔德问题长期占据焦点,而叙利亚库尔德问题则始终处于低潮。虽然1984—1999年的土耳其库尔德问题和1991年的伊拉克库尔德人大起义有一年的交汇,但二者属性不一,前者为连续但散发式的暴恐袭击,后者则是海湾战争背景下伊拉克库尔德人内部爆发的反政府起义,二者并未表现出真正意义

^① David McDowall, *A Modern History of the Kurds*, p. 158.

^② Edmund Ghareeb, *The Kurdish Question in Iraq*,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31.

上的跨界关联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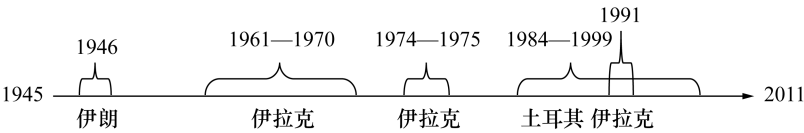


图3 中东变局前各国库尔德问题的历时差异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2011 年中东变局后，各国库尔德问题之间的历时差异被逐渐打破：（1）2012 年以来，叙利亚库尔德人兴起与“罗贾瓦自治”；（2）2014—2017 年，伊拉克库尔德人壮大与独立公投；（3）2011 年以来，土耳其库工党活动的扩大与频繁；（4）2022—2023 年，伊朗库尔德人引爆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游行。这表明，一种全新的发展态势已经开始出现在各国库尔德问题之间，即它们的“同时共振”与“时差缩减”（如图 4 所示）。换言之，库尔德问题的时间维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国库尔德问题显露出“库尔德斯坦时间”的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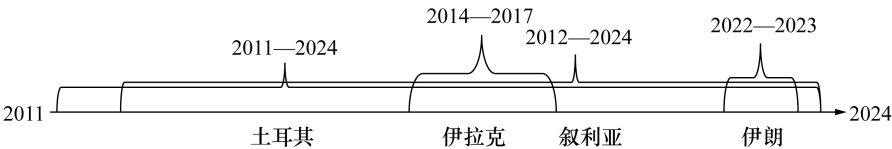


图4 中东变局后各国库尔德问题的“同时共振”与“时差缩减”

图表来源：笔者自制。

（二）库尔德斯坦各次区域在国家边界的限制上取得突破，作为整体的内聚性得到强化

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危机的背景催化下，库尔德斯坦地区南部（伊拉克库区）和西部（叙利亚库区）实现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地域互通的首次突破。尤其在 2015—2017 年间，伊、叙、土三国边界往南 150 公里的领土，即北起三国边境交汇点、南至伊拉克一侧的巴季和叙利亚一侧的沙达迪的片区，都被库尔德人实际控制。而传统国家边界消解与弱化的重大影响，不

限于观念上其对库尔德人国家认同造成的猛烈冲击,更是地理空间的突破带来了两库区在社会与经济层面的密切联系,这会反向以切实的社区融合和利益共存等要素导致库尔德人国家边界意识的淡化,强化他们对库尔德斯坦地区内聚性的理解。诚然,在此之前库尔德斯坦各次区域间有着经由非法走私口岸形成的人员联系,但主要还是集中于精英化的政治反对派群体,而并未达到如中东变局后的流动规模和联动属性。

从2016年开始,伊拉克和叙利亚库区建立起常规性的边境往来机制,通过由北往南的拉比阿—亚鲁比亚(Rabia-Yarubiyeh)、赛义马勒凯—菲什·哈布尔(Symalka-Faysh Khabur)、瓦利德(al-Waleed)和法乌(al-Faw)四个常设边境口岸,以及一系列因叙伊“国家”衰退而开辟的非法走私口岸,两侧人员和货物进一步流动。(1) 人员流动方面。大量叙利亚库尔德人通过口岸进入伊拉克库区谋生赚钱、寻求安全庇护或就医。据统计,仅在2011—2013年年间,从哈布尔口岸抵达伊拉克库区的叙利亚人就达15万人,截至2017年,由该口岸进入伊拉克的叙利亚难民增至25万人。^① (2) 货物流通方面。这些口岸同时成为双边开展生活和生产必需品贸易的重要通道,其中的战略物资主要以钢铁、糖、水泥和化肥为主,同时包括塑料、手机、纺织品和电子产品等。据统计,两国库区每天通过瓦利德口岸交易的水泥量达60万吨,钢铁量达1000吨,糖量达2000吨。为加快贸易流程,伊拉克库区政府和叙利亚北部和东部自治政府(简称“叙北自治政府”,AANES)还在边境两侧各设十余处清关办事处,并成立专门的贸易公司来对接边境贸易。^②

同时,边境贸易的激增还催生出新的商业利益共同体,进一步强化着两地区库尔德人的社会联系。例如,仅伊拉克库区杜胡克省扎胡地区一处的蔬菜贸易,就让叙北自治政府新增近2000个贸易商并从中盈利。^③ 此外,两地区间由当地村庄或部落控制的一些天然豁口,也成为开展石油、毒品和武器走私贸易的通道。甚至在特殊情况下,这些走私通道还成为人员

^① Harith Hasan and Kheder Khaddour, “The Making of the Kurdish Frontier: Power, Conflict, and Governance in the Iraqi-Syrian Borderlands,” *Carnegie Middle East Center*, March 2021, p. 12.

^② Ibid., pp. 13-14.

^③ Ibid., p. 13.

流动的途径。例如,2019年10月,土耳其军队对叙北发起“和平之泉”(Operation Peace Spring)跨境军事行动时,有数万库尔德人通过这些走私通道逃入伊拉克库区避难。^①

此外,鉴于2012年起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其也相应控制了部分连接叙土两库区的过境口岸,如艾因角和艾因迪瓦尔等,这也和叙伊库区一样取得一定突破,推动了边境两侧库尔德人员和货物流动。但是,由于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控制的口岸规模和数量有限,以及土耳其对涉库尔德问题的边境政策日益严格与安全化,叙土库区的空间联动未能达到叙伊库区的程度。^②

(三) 库尔德人自治实践扩容,内部出现激烈的模式竞争

借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契机,叙利亚库尔德人组建武装“人民保卫部队”(YPG)。2012年7月,该组织及其所属政党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简称“民主联盟党”,PYD)开始控制科巴尼地区,并逐步扩大到叙利亚北部库区的势力范围。此后,民主联盟党开始推动建设库区自治政府,一方面,是出于客观现实需求,填补危机后的权力真空,维护安全秩序;另一方面,则是出于主观上对自治的渴望。2013年6月,民主联盟党领导在其控制区成立临时过渡政府,9月成立临时代表委员会,负责起草临时宪法和举行立法选举,并于11月选举产生由60名代表组成的罗贾瓦临时议会。2014年1月,临时议会宣布成立罗贾瓦联合临时政府,下辖阿夫林、贾兹拉和科巴尼三省。随着叙利亚库尔德人控制范围扩增至拉卡、曼比季、代尔祖尔等阿拉伯地区,临时政府持续扩容,直至演变为2018年9月的叙北自治政府。虽然叙北自治政府没有像伊拉克库区政府一样获得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合法承认,但从既成事实看,叙利亚库尔德人取得了和伊拉克库尔德人一样的国内自治地位,其自治政府、下属政党和民间组织也陆续在海

^① Harith Hasan and Kheder Khaddour, “The Making of the Kurdish Frontier: Power, Conflict, and Governance in the Iraqi-Syrian Borderlands,” p. 14.

^② Benoît Montabone, “The Wartime Emergence of a Transnational Region between Turkey and Syria (2008-2015),” in Leila Vignal, ed., *The Transnational Middle East: People, Places, Borders*, London: Routledge, 2017, pp. 186-190.

外设立代表处。这意味着,自治实践已不再是伊拉克一国库区所发生的孤立事件,而且是在作为库尔德问题传统薄弱环节的叙利亚库区实现了突破,进而占到整个库尔德斯坦的一半。

更重要的是,叙利亚库尔德政治空间的洞开,引发了库尔德人内部密切的政治合作和激烈的模式竞争。一方面,在伊拉克库民党的协调下,其支持的库尔德民族委员会(简称“库民委”,KNC)与深受库工党影响的民主联盟党于2012年在伊库区埃尔比勒达成协议,宣布成立库尔德最高委员会(SKÇ),共治叙利亚库区。2014年10月,双方达成另一项军事合作协议,组建一支联合武装部队,共同打击极端组织。随后,主体由伊拉克库尔德人组成的“罗贾瓦敢死战士”武装(Roj Peshmerga)进入叙利亚,培训和协助“人民保卫部队”的作战任务。另一方面,关于叙利亚库尔德人究竟应该走怎样的自治道路,库民委和民主联盟党及其背后的两大传统库尔德民族主义政党伊拉克库民党和土耳其库工党,产生了严重的路线与模式分歧:(1)在前者看来,库民党已然践行出一条成功的“库区政府模式”(KRG model),成为伊拉克宪法认定的自治联邦,并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具备了“准国家”的属性,因此,叙库应该予以效仿和复制;(2)在后者看来,传统国家的路径已经无法解决库尔德问题,库区政府及库民党和库爱盟已然腐化,无力回应库区内日益激化的经济社会矛盾,难以发挥模式的作用,而“库工党模式”(PKK model)即库工党领袖和理论家奥贾兰的“民主联邦”理论为此提供了解决方案,该方案主张突破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叙事,充分发挥地方性的基层力量来进行自治。^①正如库尔德未来运动(KFM)领导人米什阿勒·塔莫(Mishaal Tammo)在与叙反对派谈论战后国家属性的表态“如果叙利亚人依然倾向于阿拉伯人,我们将转向埃尔比勒和迪亚巴克尔”^②,充分表明了两种“模式”在库尔德人内政中的两极

① Joost Jongerden, “Governing Kurdistan: Self-Administration in the Kurdistan Regional Government in Iraq and the Democratic Federation of Northern Syria,” *Ethnopolitics*, Vol. 18, No. 1, pp. 61-75.

② Christian Sinclair and Sirwan Kajjo, “The Evolution of Kurdish Politics in Syria,” in David McMurray and Amanda Ufheil-Somers, eds., *The Arab Revolts: Dispatches on Militant Democracy in the Middle Eas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86.

地位。

在叙利亚危机中，“库工党模式”长期占据上风，成为叙北自治政府运转的依据，“库区政府模式”则处于边缘化的地位。但随着 2024 年 12 月阿萨德政权被推翻，叙利亚过渡政府试图开启重塑中央权威的军事与政治进程，叙利亚库尔德人也开始展现出在叙利亚复制“库区政府模式”的动向。两个“模式”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撕裂了库尔德人本就薄弱的内部团结，进一步加剧了库尔德政党政治的派系化与极化。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很大程度地说明，库尔德人政党政治发展和政治行动的范围已突破各自所在国的既有边界，表现出库尔德内部政治的强烈属性，即库尔德人对库尔德斯坦共同的拉锯、博弈与争夺。

（四）库尔德人共同追求自治，而伊拉克库尔德人谋求独立建国

受阿拉伯多国爆发反政府抗议示威的刺激，四国库尔德人也效仿发起示威游行，要求政府给予他们平等的公民待遇，尊重其作为少数民族应享有的区域自治权利。^①在此之前，叙利亚库尔德人主要追求最基本的生存权与公民权，土耳其和伊朗的库尔德人则更多要求政府满足其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诉求。尤其在 2012 年的叙利亚库区和 2022 年 9 月伊朗库尔德女孩吉娜之死事件引爆的库尔德人大规模抗议示威中^②，对自治诉求的呼吁变得更为响亮。同时，在库尔德人自己看来，其引领的变革进程不仅仅限于库尔德人一族，而是一场意义更为深远的政治与社会革命，因为其中被频繁提及的地方自治、性别平等、信仰自由、无政府主义、集体农庄等政治概念，被认为挑战了传统的“阶级、性别和权力的规范”^③，对摆脱中东复杂的政治社会困境同样有着启示意义。

此外，已经实现区域合法自治的伊拉克库尔德人发起更大的理念挑

① 王佳尼：《中东社会转型与库尔德问题》，《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 年第 1 期，第 37—55 页。

② Wladimir van Wilgenburg, “Iranian Kurds Go on Strike to Protest IRGC Attacks on Kurdistan Region,” *Kurdistan 24*, October 1, 2022, <https://www.kurdistan24.net/en/story/29602-Iranian-Kurds-go-on-strike-to-protest-IRGC-attacks-on-Kurdistan-Region>, 2023-08-18.

③ “Efrin Economy Minister: Rojava Challenging Norms of Class, Gender and Power,” *COOP*, December 22, 2014, <https://mesopotamia.coop/efrin-economy-minister-yousef-rojava-challenging-norms-of-class-gender-and-power/>, 2023-08-18.

战,试图想象新的中东国家边界。2017年9月25日,伊拉克库民党主导发起一场330万人参加的库尔德独立公投。从公投72%的参投率和92.73%的赞成结果来看,^①具有独立倾向的民族主义已然成为当前伊拉克库尔德社会内部一股影响力巨大的政治思潮。虽然公投最终以失败告终,伊拉克库尔德人未能守住打击极端组织期间在争端领土上获得的既成事实优势,还遭到中央政府和周边国家的外交孤立与经济惩罚^②,但在随后的历年同日时,不限于伊库区的库尔德人都对这一场失败的政治实验开展规模不一的纪念活动。这为库尔德人集体记忆的建构,又增添了一份具有独立建国象征意义的历史素材。

结 语

库尔德问题表明,跨界民族不应因其跨界属性而天然地意味着其足以构成一个地区安全问题。现代国家既有边界和国家建构进程等强有力的规制,使得跨界民族往往难以突破时间、空间、行动和理念的束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跨界”并走向区域,进而整体性地对该地区形成地缘安全冲击和挑战。在此意义上讲,“中东库尔德问题”不再是一个客观的地理修辞,而是具有突破各国库尔德问题边界的地区性内涵。也就是说,各国的库尔德问题正在发生内聚为一个“库尔德斯坦问题”(Kurdistan Question)的演变趋势。

从库尔德问题在中东区域层面生成的内在机制来看,具有强烈独立倾向和去中央集权化诉求的库尔德政治思潮及组织的出现,并非如库尔德民族主义政治精英所长期致力于对外塑造的原生主义视角,即民族主义思想为库尔德社会内部所集体共享并贯穿始终。换言之,库尔德民族主义从来不是一个既定结果。事实上,这是库尔德人“他者化”的历史情结,受相关四国现代国家建构进程中烈度不一的大民族主义叙事和集体性惩罚措施

^① The Independent High Elections and Referendum Commission, “Primary Results,” September 27, 2017, http://www.khec.krd/pdf/173082892017_english%202.pdf, 2018-10-15.

^② 唐恬波:《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公投”述评》,《国际研究参考》2017年第12期,第17页。

的激化,向“他者化”和政治化的集体性创伤记忆演进而成的结果,四国政府成为库尔德人塑造“自我”时共同的“他者”。但是,库尔德问题在各自所在国内部出现的这种共同嬗变,本质上只是一种干预变量,只有在核心自变量国际变局的激化下,作为因变量的库尔德人共同的对外政治行为,才能发生转向,走向中东。

但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作为干预变量的库尔德人“他者化”集体记忆的出现,还是作为自变量的中东变局的爆发,其本质上还是相关四国在政治、经济、安全和意识形态等层面国家理念偏差、决策失误与能力不足导致的结果。因此,一国在其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能否打造强大稳定的国家能力,避免本国多民族的社会与文化属性被政治化乃至上升为“高政治”问题,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跨界民族是否会在地区层面成为问题。从目前来看,两方面因素导致“库尔德之春”渐入低潮:其一,2017年下半年中东进入“后伊斯兰国”时代,库尔德人在全球反恐中的战略重要性减弱;其二,随着乌克兰危机、加沙冲突与美国政府换届等一系列国际政治事件,库尔德人所在四国的中央政府,在大国政治或地区战略博弈中纵横捭阖、辗转腾挪的空间扩大。这再次表明,国际体系在对外行为变化中具有最重要的深层诱因地位。尽管如此,库尔德问题在中东地区层面生成的内部机制已然存在,并经十余年中东变局的发酵得到固化和延续,因此,当国际体系因素未来一旦提供适合的机遇,都将进一步扩大库尔德问题的地区性内涵。由此来看,“库尔德之春”的“转寒”只是一个周期性而非趋势性现象。